



傳記、文書與宋元明思想史研究*

朱鴻林

中華文史論叢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一 近世思想史的研究不足之處

中國近世(宋元明)思想史的著述框架,主要由精英人物和高深理念的論述所構成。整體上多以宏觀概論的態勢出現,內容則以理念的認定和敘述以及思想流派的演變為主。這些著述的研撰策略,多是以大面蓋小點的,粗線條見大輪廓的,大膽假設形態的。職是之故,不少框架內的重要成份並沒有受到理會,即使是反映士大夫階層關心所及的思想,也多沒有獲得應有的注意。

現存的近世思想史著述,多數有着這樣的組織特徵:(1)兩宋時期,以理學的興起和確立為論述線索,而以若干有名的儒者以及耳熟能詳的學派為論述脈絡。(2)元明時期,以朱陸異同以及程

* 本文初稿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編輯部、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聯合主辦之“新世紀中國歷史學:挑戰與思考”學術討論會(2002年11月20—21日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上宣讀。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2006
總第八十二輯

朱學派與陸王學派的勢力消長和人物離合為論述線索。多數著作的分章、標題或有不同，潛在理路卻基本一樣，所論述的人物也基本相同，雖然數量多少視乎篇幅而定。

取材和做法上，也多有彼此相同的特徵。取材方面，早期著述靠的主要是幾部《學案》以及正史中的傳記。後來，尤其集體研撰的書籍，也直接取材於人物的單行著作。由於注意人物的“思想”多於注意他們的“生平”，通常採用的是他們的專著，而非他們的文集。作法方面，多數是抽取見於重要篇章的思想理念，而加以論析評說。在《學案》著作的撰述形式的影響下，論述多以思想家為單元，人則給予傳略，書則給予節取，引述與評論並行。

整體上看，論述所關心的，沒有超過《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的範圍多少，仍然只是理學、心學等高深理念的述論；從中見到的思潮，也只是這些高深理念的傳承流變，很大程度上與哲學史沒有分別。知識人物的其他重要思維，以及其思維所導致的事情和制度、風尚、禮俗的思想面，都甚少見到論述。一些在思維上和行事上對學者和對社會有實際影響的典籍，也都甚少見到介紹論析。《宋明理學史》論述到永樂年間三部《大全》（即《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和清初《明儒學案》及《宋元學案》的編纂的學術和思想史意義，^①已是難得的高見。

單純的抽象理念的述析，其實掩蓋了士人們的真正思想對象。譬如，宋元明時代希望學古入官的士人，他們絕大多數有着像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詩句所傳達的意識，這意識讓他們自然產生從事致君澤民的經世之學的思想，而這思想也就是新儒家的共同理想所在。王安石說的“經術所以經世務”，劉彝說胡瑗所

^① 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下冊，第1—2章，27—28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教的“明體達用之學”，朱子說的“全體大用之學”，都是這種思想所展現的學術。國家以化民成俗為施政宗旨，學者以修己治人為學問工夫，擴而充之便是所謂內聖外王、明德新民的工夫。其要點就是“人才”的培養與“法度”的建立和有效施行。這種思想不只大儒們有，很多由儒學教育出身的士人都有。

這個共同理想的存在，對於思想史的研究十分重要。知道了它的存在，論述這些士人對於如何實現他們的志望的論思，便成了思想史探究的重要對象。修己治人結合於一身，是士人們不變的理想境界。實踐上的選擇則是：能夠出仕時，則服官施政以行道；政治前景好時，尋求行道於朝廷，推及天下，像范仲淹、王安石方式的變法事情都是。時不我與時，則修身講學以明道；政權高壓或政治腐敗時，明道的事功，或見於著述，或見於身教，像司馬光修《書儀》，藍田呂氏兄弟修鄉約，朱子一志於著書講學，修《家禮》、增損呂氏鄉約之事都是。像明代中後期政府無能、治安發生問題時，士大夫推廣落實《家禮》、鄉約之事也是。我們如果從這樣一個立體的構思架構來範圍思想史的內涵時，思想史的內容便將豐富不少，而其需要提出和給予回答的問題，數量也必增加不少。

退一步說，即使只從傳統思想史著述所處理的學派源流方面看，需要照及的地方也還存在。研究宋元明思想史，大路離不開程朱學派和朱子學、陸王學派和陽明學的主線。但以往的研究，朱學方面的，多數注重它在宋末起的官學化，它在元代和陸學的合流，它在明初表現於重視個人內在修養的身心之學，^①等等。對於朱子身後，程朱學者怎樣總結和傳播朱子學術思想的事情，以及對朱

^① 尤其論析明初儒者着重個人修養，導致後來心學興盛的研究。參看陳榮捷《早期明代之程朱學派》，載其著《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頁331—351。

子學術所揭櫫的政治、社會等現實主張的體現，都沒有足够的注意。王學方面的，多數注意陽明心學理論的主觀色彩，泰州學派解放人性的社會自由意識，等等。對於王學所產生的吸引力和號召力的着實原因，對於泰州學派之外的王門人物展現王學思想的言行表現，也都沒有足够的注意。^①

再就朱子學的發展而言，朱子之學從南宋末年隨着朱子所定的道統獲得朝廷承認而開始擡頭，隨着元代科舉以程朱經注取士以及明初《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等官纂典籍之褒揚程朱學派之說，成了官方正統之學，直到明代中葉王陽明起而抗衡，纔漸漸為心學所實際超過。但從官方的立場言，一家獨尊之勢終明一代以至清代前期都沒改變，這是盡人皆知之事。但朱子學之所以為陽明學所蓋之故，亦即朱子學本身的隱憂所在，卻不是同樣的盡人皆知。同樣，王學出現不久便見風行，到晚明極盛之時，反對之聲亦隨之出現，至清初而轉衰。這也是盡人皆知之事。但王學盛時，人們怎樣評價陽明其人，怎樣了解王學的內蘊，以及王門流派之間的關係，也不是同樣的盡人皆知。可見，朱子和王陽明各自身後的學術傳播情狀，其實都還有待更多的深入研究。

形成這些認識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對於研究對象沒有足够的認定，以及對於他們的言行沒有足够的認識。由於思想史論著對“思想”的理解是狹義的，因而對於讀書人實有影響的人物和著作，往往沒有給予論述。由於對思想家的傳記研究未够全面和深入，因而不能認清思想家本人所關心的問題和他的學術所致力之處。又由於對思想家的著作的內容、存在形態及傳播歷史沒有系統的研究，因而不能客觀地認識對後世實有影響的知識和思想，也

^① 這個情形現在正在改變，相關研究已見增加趨勢，最近的深入研究，有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羣——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

不能夠論述它們的影響情形。

彌補這個認識不足的可行做法之一，便是在已有的宏觀和概論式的論述基礎上，大量補充對思想發展有關係的人物的細緻傳記研究，同時對他們所遺存的文書給予微觀析述，並且加強研究思想、理念的演變情狀和文書的傳播情狀。

以下所舉我對熊禾(1247—1312)、丘濬(1421—1495)、王守仁(1472—1529)的一些研究，似可反映深入而細緻的傳記和文書研究，其發現足以擴大和充實宋元明思想史研究的未備之處。^①推而廣之，若以同樣取向繼續研究其他人物和文書，其新發現的累積結果，終將能够使此時期思想史呈現一個多彩而清晰的圖像。

二 熊禾對朱子學的闡揚^②

對於宋元朱子學發展情形的論述，一般會以黃榦和金華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的授受為正統主幹，旁及江西由饒魯至吳澄的朱陸和會學統，再加上元初以來北方由趙復、許衡、劉因所傳的朱學。其實，宋元之間，還有一衆自具學統，努力闡揚朱子學術的人物存在。福建著名儒者熊禾便是其中一例。

熊禾字去非，號勿軒，生於朱子的本邑建陽縣，宋末登科入仕，宋亡隱居不出，長期在崇安、建陽二地講學授徒，以闡發朱子學術

^① 下文所據的個人論著，絕大多數都發表於國外，有的是用英文寫的；引用舊作，目的只在證示本文論旨，各文原來的注釋，除了直接的引文之外，均予省略。

^② 此節所論，根據以下兩文：(1)朱鴻林《元儒熊禾的傳記問題》，載《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344—354；(2)朱鴻林《元儒熊禾的學術思想問題及其從祀孔廟議案》，載《史叢》第三卷，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1998年，頁173—209。

和尊崇朱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道統為職志，卒後配祀於建陽的朱子祠。熊禾有關儒家道統的議論以及對學校孔廟祀典的主張，在明清時代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有的甚至成了制度。他本人在明代成化年間也被題請從祀孔廟，只是沒有成功而已。

熊禾的著述很多，門人也不少，但因他成熟於宋亡之時而又以不仕新朝終身，門人也沒有在政學兩界顯名的，以故他雖名列鄉賢，卻在《元史》沒有傳記。但他致力於朱子學術的成就，始終為後代識者所一致承認。明代嘉靖中晚期朱衡著的《道南源委錄》、楊應詔著的《閩南道學源流》，清康熙年間黃宗羲開始撰著的《宋元學案》、乾隆年間李清馥著的《閩中理學淵源考》等書，都有他的傳記或學案。可是，這些傳記所根據的文字，既傷於簡略，也有明顯的失誤，對於熊禾的學術背景和重要主張，都不能提供正確而足夠的資訊，也沒有說出熊禾議論對後世的影響所在。198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令印、陳其芳著《福建朱子學》一書，雖然為熊禾立了專節討論，但主要處理的是熊禾的哲學思想和觀念，對於他的傳記和學術活動的敘述，仍是沿襲舊說的。

我在1998年發表的兩篇研究熊禾的論文中，利用熊禾傳世文集的幾個版本以及他的幾種傳世經學著作為素材，對他的傳記和歷史待遇加以訂正補充，對他的學術思想的淵源和大旨以及明人對其學術所作議論的意義有所討論。這些研究首先訂正了歷來關於熊禾的師承之說的錯誤，指出熊禾的學術並非如始作俑者的明初僕處約所撰《勿軒先生傳》所說，出於朱子門人輔廣，^①而是淵源於自己的家庭而模擬於永嘉學術的。熊禾的族叔父熊節是朱子的門人，對他的學問有影響；他的從伯父熊慶胄是朱子的再傳或三傳門人，對他影響更大。

^① 見《熊勿軒先生文集·附錄》，叢書集成本，2407冊，頁77。

永嘉學術對熊禾的影響，見於熊禾自己所說：他二十八歲成進士之前，“遊浙中，受業於劉敬堂先生，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勉齋黃先生（黃榦）、潛室陳先生（陳埴）論學之要旨。”^①劉敬堂這個關鍵人物，清人王梓材在《宋元學案》卷六四的按語中推測他是輔廣的門人，李清馥在《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七《建寧熊勿軒先生禾學派》中更將他說成是金華四先生之一的金履祥。我從一本清抄本的熊禾著作《勿軒易學啓蒙圖傳通義》的序前一頁，看到抄者所錄幾條關於熊禾著作的書目敘錄，其中一條引“元刻董真卿《周易會通》引用諸書群賢姓氏”之說如下：“〔熊禾〕其學得徐進齋及永嘉劉敬堂經濟之學。有書四篇，曰農禮刑兵，稿粗定而無傳。今所行世者，《標題四書》及此《易說》數段。又有《詩選正宗》等編，雜文多見《翰墨全書》。”^②董真卿是鄱陽人，從熊禾的文集知道，董氏曾隨其師胡一桂入閩訪問熊禾，熊禾且為他序刻其父所著的《孝經大義》，故此董氏之言，應該可信。

董氏文字所提供的這個劉敬堂為永嘉人的資訊是重要的。熊禾自己說是從劉敬堂處獲聞朱子晚年與黃榦和陳埴論學的要旨的。陳埴正是永嘉人，可見劉敬堂為永嘉人也可相信，而其學則是朱學之中兼有永嘉傳統的經制之學的。黃榦曾監嘉興府石門酒庫，石門正是浙中之地，劉敬堂遊於浙中，自然也有可能從黃榦問學而獲聞文公晚年之旨。總之，熊禾固然在浙中受業於劉敬堂，但不等於劉敬堂之學即是行於浙中的輔氏之學。董真卿提到的徐進齋，是崇安人徐幾，精於《易》學，他和熊禾的從伯父熊慶胄一樣，都是朱子門人蔡淵和再傳門人真德秀的門人。無論如何，從熊禾

^① 熊禾《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一《送胡庭芳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② 《勿軒易學啓蒙圖傳通義》，見《續修四庫全書》，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441。

和輔廣的年代來看,說熊禾學出輔廣是沒有根據的。

李清馥將劉敬堂說成是金華的金履祥,更屬牽強附會。李氏的根據是這樣的:乾隆二十七年(1762)他在金華府蘭谿縣的書坊中,購得一本金履祥文集的抄本,從此書卷一所列的“刊刻門人十人”中,看到第一名的就是“熊銖”,而從金履祥本傳以及《金華正學編》,得知金氏原來姓劉,為避吳越王錢鏐嫌而改姓金;此外,金履祥從學於北山先生何基,何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遂著《敬齋箴》”,故此雖然不能確證金氏有“敬堂”這個別號,但金氏如有別號,則“敬”字必在其中。李氏推論的結果就是:劉敬堂即是金履祥,而熊禾或因亡國忌諱之故,或為寄托亡國之痛之故,將金履祥的姓氏改作金氏原來的劉姓,猶如他將自己本來名的“禾”字改作“銖”字一樣。

我從金履祥的文集版本研究,知道金氏文集其實在元代並沒有編刊過,明代中葉纔有董遵首次將金氏家藏的殘稿和見於他處的金履祥文字編成《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從李清馥所購抄本所列的所謂金履祥門人的履歷考察,又發現可考的人物都年輩高於金氏,其中的陳淳更可算是師祖一輩,可見這些題名都是無識者或射利者為了擡高金氏身價而偽作的。從金履祥的老師何基和王柏的文集考證,又知道何基沒有作《敬齋箴》贈金履祥之事,王柏也沒有《敬齋箴》之作。再從金履祥及其高第弟子許謙的文集考證,發現他們都沒有在一處提及熊禾。這樣,熊禾學承金華之說自然不能成立。

辨正李清馥所說之非,對於別白金履祥和熊禾二人各自的師友淵源和學術思想都有重要性。李氏徒知金華之學紹自黃榦,得朱子的傳之真,故此以為熊禾在朱學上之能深造自得,必是原於金華所致。其實,金履祥固然是“明體達用之儒”,但我們既知劉敬堂為永嘉學者,也便可知熊禾所主張的所謂全體大用之學,其實也是朱門善學者所共唱,而非某一門派所得獨專的了。

從熊禾的生平看,我們還可見到宋末認真的學者(尤其朱門學者)他們所關心致力的學術之所在。熊禾少年學習舉業之後,年及弱冠,纔因讀《大學》有得,“自此益窮研《四書》,以及諸經,務為明體適用之學。”^①後來遊浙中、受業於劉敬堂後,得聞經濟之學,開始有志於世。他舉鄉試後心裏想的學術志業有二:其一是“欲仿文忠公真西山先生〔真德秀〕《〔大學〕衍義》,只就學者分內事,輯為後傳,以見明體適用之學。”^②另一是“效《〔通鑑〕綱目》例,以左氏書實其事,以公〔羊〕、穀〔梁〕、程〔頤〕、胡〔安國〕諸家之說足其義”的《春秋》傳義工作。^③他認為這些都是“自度必無所用於世”時的“自求切己受用”之學。

熊禾三十八歲時宋亡,此後十二年間,他都住在武夷山讀書講學。到了五十歲那年,纔返回建陽故居,在鼇峰書院聚徒講學。這時他的講學重心,有所謂“求仁約”,目的是求達到可以措諸行事的《大學》之道,主要講究的是《三禮》之學。五十五歲起的三年,熊禾南遊在外,曾為福州郡學的五賢祠作記,連帶著論了影響遠大的學校《祀典議》。^④同時間內,他又募刻朱子所創始的《儀禮經傳通解》,以“考亭諸名儒參校訂定墨本,擬就書坊版行,以便流布。”^⑤六十一歲時,他為重建的建陽考亭書院作了著名的《考亭書院記》,以“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的名句,^⑥給朱子

①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五《謝鄉學論學》,頁68。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熊禾所著學校祀典議的後代體現,可參看《明史·禮志四》“聖師”、“至聖先師孔子廟祀”,以及《清史稿·禮志三》“傳心殿”、“至聖先師孔子”各節。最近相關討論,可參看朱鴻林《明太祖的孔子崇拜》,《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年,頁483—530。

⑤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四《刊儀禮經傳通解疏》,頁56—57。

⑥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三《考亭書院記》,頁29。

賦予了文化史上僅次於孔子的地位。

熊禾卒年六十六歲。他一生著述豐富，而以儒家經典的訓解為主。他的友人史葯房這樣說他的著述形式和方法：“如《易》、《詩》、《書》、《春秋》，皆爲之集疏。集疏云者，每經取一家之說爲主，而哀衆說以爲之疏。工夫浩博，義例明暢。……復爲《小學》、《四書》集疏，以羽翼之。”^①這類集疏式的經學著述知名的約有十種。史學方面的著述有兩種。編纂的書籍有《詩選正宗》和“取文公諸書，擇其精且要者爲一編，而以邵〔雍〕、馬〔司馬光〕、張〔栻〕、呂〔祖謙〕及朱氏門人之說爲附錄”的《文公要語》。^②

熊禾的經學著述基本上都是補充和訂正朱子經說之作。這是他刻意羽翼朱學表現，其實也正是他的學術思想的體現。熊禾主張的學術，是北宋胡瑗湖學設教的所謂明體適用之學和朱子所強調的所謂全體大用之學，亦即一種準古酌今、於經有據而可見於行的社會屬性學問。這種學問以儒家經典的道理爲根基，以經史時務實學知識爲內容，以禮制的建行為發用。宏觀地看，它仍是通經致用和經術以經世務的漢宋傳統思想的延續體現。經學終歸是治道的根源，也是儒學的基礎，這在熊禾來說，是篤信無疑的。

熊禾以朱子的三傳乃至四傳門人之名，私淑後學之實，自稱要做朱子的忠臣，他的同時人觀其所行，則稱他爲朱子的孝子，後人核其所得而稱他爲朱子的功臣。他的學行所反映的，正是一個立志從事朱子學術者的言行一致表現。熊禾有功於朱子之處有二：其一是，論成自堯舜至程朱的所謂道統正傳，使朱子成爲孔子之後

最偉大的“正學”集大成者；其二是，以經籍的訓解具體地對朱子的經學體系加以整補充實。他的畢心力於朱子之學，和他堅持朱子之學確實與世道攸關的信念是分不開的。

熊禾以勝國進士而選擇不仕新朝，隱居聚徒，其理由是不能以利益之說來解釋的，因此他的“以道自任”行事，也就不能以學派門戶或鄉黨情結說之。他的動力來源，其實是他那種只有經具完書纔能講學得正而治道得明的思想。在他的想法中，朱子的偉大貢獻正在於使那些有缺憾的經典獲得完整的文本和義訓，因此惟有完成朱子未竟其功的經學事業而使之昌明於世，明道致治之功纔有可能實現。這思想的實踐，便是他篤志守先待後的講學和著述事業。熊禾自身不仕元朝，卻不因而望道不明於世和不行於世。所以他能以忠於朱子之學爲務，同時也能稱贊仕於元朝的許衡之能昌明朱學，且因之而在政治上作出貢獻。他的文化襟懷是闊大的。

他對朱子的尊崇和對所謂全體大用之學的反覆強調，對於後世學術也有實在的影響。他曾欲就“學者分內之事”補充真德秀的《大學衍義》而爲其“後傳”，其事未見成就。但明朝中葉的丘濬卻真的著成了經世巨著《大學衍義補》，爲學者提供了治國平天下的知識，並且認爲有此補足，纔能使“大學”真正成爲全體大用之學。熊禾的道統相傳之說和“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的名句，也都見於丘濬所輯的《朱子學的》一書的正文之前的圖像上。由此可見，熊禾對於後代善學朱子的學者的影響着實不小，而他所體現的補充朱子之學、使之體系趨於完整的學術，也一直延至明代中期還未斷絕。

①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六，史葯房《送勿軒先生歸武夷序》，頁80。

② 馮繼科等纂修《建陽縣志》卷一二《儒林傳·熊禾》，明嘉靖三十二年刻本。

三 丘濬對朱子學說的系統性表述^①

從熊禾的生平事迹,我們看到一些近世思想史論著所未論及的朱子學發展情形。近世思想史論著對於陽明學出現之前,跨越南宋、元、明初三個相當不同時代的朱學發展情況,主要論說有二:其一是,在這時期內,朱學和陸學有實際和會的趨勢;其二是,明初的朱子學者,重心身修養躬行過於格致窮理。我透過對明人丘濬編輯的《朱子學的》(原稱《學的》)的文書歷史研究,發現近代著作的如上論述,其實忽視了同一時段內,朱學發展史上另外一種同樣重要的事情:對於朱子身後,學者如何系統性綜結及傳述其學說的工作,沒有脈絡性的論述。

《朱子學的》成書於天順七年(1463),是丘濬在明代(甚至在清代)四本很有影響力的著作的首本。其他三本是成化十年(1474)成書的《家禮儀節》,成化十五年成書的《世史正綱》,成化二十三年成書的《大學衍義補》。這些著作都是補充、解釋、修訂朱子或朱門著述之作,客觀地反映了丘濬是個終身的朱子學者。《朱子學的》雖然不是丘濬最知名和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但在朱子學派的文獻中卻始終占有顯著的地位。明儒顧允成曾寄高攀龍《學的》二冊,附書說此書“殊有條理,丈試閱之何如。”^②清儒陳瓊

^① 此節所論,根據以下兩文:(1)朱鴻林《丘濬〈朱子學的〉與宋元明初朱子學的相關問題》,載林天蔚編《嶺南文化新探究論文集》,香港,現代教育研究出版社,1996年,頁63—79;(2)朱鴻林《〈朱子學的〉的流傳與評價》,《史叢》第二卷,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1996年,頁177—198。

^② 顧允成《小辨齋偶存》卷六《簡高景逸大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92冊,頁313下。按:此書或與高攀龍纂輯《朱子節要》事情有關。

《寄子書》說:“《朱子學的》內聖外王道理無一不備,是儒者有體有用之學,非但有益作文而已;予逐句點斷,易看易讀。”並寄回要其子“細細看過”。^①此書所曾受到的重視,於此可見一斑。

《朱子學的》的版本與流傳情況,也反映了它的重要性。我們還能夠重建它在明代的三個傳刻系統:這三個系統的最早刻本分別見於(1)弘治八年(1495)之前,(2)弘治十四年之前,(3)正德三年(1508)之前。它們現存的明刊本還有正德三年、隆慶五年(1571)和萬曆三十四年(1606)三種。清代的刊本則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四十八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嘉慶二十五年(1820)、同治五年(1866)等刊本。此外還有一個日本承應二年(1653)的和刻訓點本,一個民國五年(1916)福建經學會的鉛印本,以及以後的多種排印本和影印本。

《朱子學的》只有上下二卷(編),每卷十篇。每篇各含若干節,每節文字由一則至多則不等,都是朱子本人的論學之語或門人後學記述朱子言行之文。書尾有丘濬的《後序》一篇,述說此書的主旨、目的以及命名和編次的理據。此書是“擬《論語》”之作,故此篇名只取該篇開頭(或首句之中)兩字命名。二十篇的篇名為:(上編)下學、持敬、窮理、精蘊、須看、鞭策、進德、道在、天德、韋齋,(下編)上達、古者、此學、仁禮、為治、紀綱、聖人、前輩、斯文、道統。這二十篇的內容總括起來,依次揭示了朱子所示的為學之道,治學之方,窮理讀書之法,踐履進德之則,人倫相處之道,理學的形而上概念,朱子生平的言行出處,天理與性道的關係,教人與治事的法則,知行的體驗關係,仁禮的關係和節目,為治與經世的道理和法則,治道與政術的大端,歷代聖賢名臣所以賢聖之故,儒

^① 丁宗洛《海康陳清端公年譜》卷下,康熙五十三年五十九歲條內《寄子書》,清道光六年刊本。按,此書陳瓊《陳清端文集》未見。

釋道的根本差異處，道統中人的學問，以及朱子所以得道統之正之故。這些內容的概括度和編次的周延性，以我們能夠掌握的文獻來衡量，都是超越前人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它不滿，將它列入存目，但也只能攻擊它的“擬經”非倫，擬朱子於孔子的不是而已。在丘濬自己的認識中，朱子的學說和教人學為聖賢的方法，都是有層次的。朱子學是有的可致而有法可循之學；由事達理，由下而上，由近及遠，由淺到深，都是有一定不可逾越的程序。

丘濬的《後序》還自問自答了《朱子學的》究竟有無必要出現的重要問題。這個問題牽涉到編輯此書的理據問題，也牽涉到著作本身的原創性和對學術有無貢獻的價值問題。丘濬的回答見於以下兩則值得引述的文字：

(第三則)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為？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為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

(第四則)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①

這兩則問答，顯示了丘濬刻意系統化建構和綜結朱子學說的用心。朱子言滿天下，但確如丘濬所說，卻沒有一本闡述一己全體學說的成書，故就尊崇朱子和闡揚朱學而言，丘濬編輯《朱子學的》之舉，實有過人的識見在。

編輯學說始創人的著述的工作，因為涉及學者從何處纔能夠

^① 《朱子學的》各本之後，又見丘濬《瓊臺詩文會稿重編》，明天啓三年刊本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學》的後序》，1248冊，頁185上。

獲得一家要旨的根本意義，本來便是學派形成過程中重要而常見之事。但就朱子一家之學而言，朱子著述的全面性編集和選擇性編輯二者，性質上和意義上都明顯有所不同。學者要掌握朱子學說的要旨，自然不能只靠闡明朱子言論的後學文字，但要親身閱讀保存原貌的原始資料，卻又難免因朱子著述之浩繁而感到茫然失措，心力不足，不易取得成就。故此最需要的，尤其對於初學或自學者而言，無疑便是一種分量適中、本身能夠自相發明而又內在連貫性強的原始資料讀本了。這情形和朱子編輯《近思錄》基本相同。《近思錄》的緣起，是因興嘆於周、張、二程之書“廣大闔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朱子的目的，是要藉此選編，呈現周張二程四家之學的梗概，讓“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得其門而入矣。”^①朱子之書，比起北宋四子，更加“廣大闔博，若無津涯”，故此同樣有待發見梗概，以示入門的需要。丘濬《朱子學的·後序》稱此書“為初學者作也”，正表明了他為初學提供門徑的用心和做法，和朱子編輯《近思錄》的用心和做法，是一脈相承的。清儒張伯行說“朱子集周張二程之言，作《近思錄》，為孔曾思孟之階梯，文莊作《朱子學的》，為周張二程之階梯”，^②把《朱子學的》比擬成綜結朱子之言，作為進入北宋理學的門徑，實是辭旨兼優而能得丘氏之心之言。是書此後的傳刻歷史也證明了它本身的價值。

為了驗證丘濬此舉是否在現實上也有必要，我進而對朱子身後至丘濬著書之前的宋元明二百五十多年的時段中，朱子學讀本的編輯和流傳的歷史進行了探索。我從黎靖德根據三種朱子《語

^① 均見《近思錄·後序》。清代張伯行《近思錄集解》（正誼堂全書本），置此文於書前，題作《前引》。

^② 《朱子學的》，張伯行撰《原序》，正誼堂全書本。

錄》和兩種朱子《語類》在咸淳六年(1270)編成的一百四十卷《朱子語類》開始考慮。這本最完善的《朱子語類》，無疑是一套朱子講學遺言的有用總匯(至少也是便於檢用的資料庫)，但卻不等於一本能讓學者進入朱子全體學說而粗得梗概的專著。為了使朱子的遺言要義容易普及學者，《語錄》或《語類》的選本或節本，自然也會應時出現。於是我從現在還能看到的這類書籍的內容和刊刻史進行研究。

這些選本或節本原來也不多，現在都成了稀珍古本。它們包括了朱子再傳門人葉士龍編纂的《晦庵先生語錄類要》(十八卷)。^①這本宋人編輯的分類語錄選本，有簡切而便於尋繹的好處，但因它根據的只是語錄而沒有采及朱子的《文集》和他的經書傳注文字，並未全面地照顧到朱子學說的各項精義和不同層次的見解，所以最多只能具備參考書的性質和作用。此書在宋元時代頗受肯定，元大德六年(1302)，因“近年書市本兵毀不復存”而有根據宋人手校本的重刻本。^②但到了明代，傳本便很稀罕，直到成化六年(1470)纔有惟一的一次重刻，所以連《四庫全書》也未見著錄。

宋人以朱子“《文集》、《語類》排比綴輯，分門隸屬”來系統化呈現朱子學說的纂述，以我們現在所知，稍早出的是朱子四傳弟子王泌的《紫陽宗旨》(二十四卷)。此書近代未見傳本，我們只能從記述它的文獻資料窺見一斑。同類書籍而現在比較容易看到文本的，是咸淳二年(1266)年張洪和齊熙所編刊的《朱子讀書法》(二卷)。張、齊二人和朱門沒有直接師承關係，他們是根據朱子門人輔廣所編集的朱子《讀書法》而編成此書的。此書宋末刊行後，元

① 此書極為罕見，本文用的是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憲宗成化六年庚寅(1470)婺源知縣韓儼刊本。

② 葉士龍《晦庵先生語錄類要》書末詹天祥識語。

時板已不存，元文宗至順年間集慶路有過一次重刻，明代被收入《永樂大典》中，改編為四卷，清代乾隆年間從它抄出改訂，收入《四庫全書》。此書是一本教人從事朱子治學方法的基礎書籍，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條分縷析，綱目井然”，^①但它畢竟說的只是朱子的讀書法，不是朱子學理的全體。

《晦庵先生語錄類要》和《朱子讀書法》有這樣的相同流傳之處：它們在宋末流行，在元代有重刻，到了明代卻成了寂寂無聞。這種現象，固然和元末兵亂之後，版籍散毀，印本不再，以致傳本日稀，見者日少的情況有關。但“稀罕”卻不能是長期隱晦的足夠解釋。整體的原因還得從當時學者的愛好和他們用心致力的事情上去考慮。時代風尚和此類作品的顯隱，實際上是互為因果和互可反映的。《晦庵先生語錄類要》和《朱子讀書法》兩書雖在元代有重刻，反映了它們仍受重視，但元人卻未見有同類的著作可考。推而言之，宋元學者對朱子學的用心注意之處，已經發生變化而有所不同。

文獻考察的結果顯示，元人治朱子學的主要趨向，是增益豐富朱子之言，而不是精簡要約朱子之言，而且多數學者的工夫，都是花在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的集釋之上。這現象其實從宋末已經開始，只是元代更加變本加厲，而且性質也漸漸有所不同而已。形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時代的推移。因為到了南宋末葉，朱子遺文和講學遺言的編集工作已經完成，學者的注意之處和用功之處自然別轉，而隨着朝廷尊朱和科舉采用朱說成為現實，注意力和用功所在便不期然地匯聚到與科舉尤有關連的朱子著作上去。這類集釋之作，在真德秀《四書集編》和趙順孫《四書纂疏》的典型示範下，出現過很多，現在尚存的也不少。但這種疏釋工作，其實是盡元代而窮的，故此到了明代，也沒有足以媲美並論之作出現過。

①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二·朱子讀書法》，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5年，頁788中。

永樂朝纂輯的《四書大全》，如眾所周知，實際上只是點竄元人倪士毅所纂的《四書輯釋》而成的。

我們回顧朱子身後二百五十年間學者從事朱子學說的概況後，不難發現，到了明代初期，儘管朱子學說已因科舉定制而變成官學，朱子學說所寓的著述，如《文集》、《語錄》、《語類》和經書傳注，也都編纂齊全，但對於系統性表達朱子學說的工作，尤其幫助初學者掌握梗概以利深造自得的工作，卻是十分不足，乏善可陳。像《晦庵先生語錄類要》和《朱子讀書法》這些宋人編纂的書籍，當時能夠知道或曾經見過的人，實在非常有限。整個局面對於闡揚朱子學說大為不利，朱學的精粹，反被朱子著述的數量和尊朱科舉用書的粗濫所淹沒隱蔽了。朝廷尊朱的本義未達，學者學朱的本領沒有著落，朱子學說其實只是表盛衰，它的精蘊還有待於有效地發揚普及。

從明代朱子學的發展史看，《朱子學的》的出現有劃時代意義。因為它是對當世作出反應的產物，它標志着朱子學者對如何傳授朱學精義這一老問題的新認識和新體會。而這個新的認識和體會，至少在以後的二百五十年間，又曾發生明顯的作用。明清二代同類的編纂為數甚多，《四庫全書》館臣甚至誇張地說是“指不勝屈，幾於人著一編”。^①但這都是出現在《朱子學的》之後的（書目見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從文獻顯示出來的事實以及《朱子學的》多次刊行的事實，客觀地也顯示了《朱子學的》獲得肯定的程度和在朱學發展史上曾經起過的作用。當然，要到了15世紀下半期纔有像《朱子學的》這種能使朱學要義具見梗概的書籍出現，朱子學的發展所受到的障礙也就可想而知了。

^①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存目三·續近思錄》，頁827下—828上。

四 丘濬與明代的經世之學^①

明代是心學盛行的時代，但這並不等於其他的學問不曾存在和無人問津。和心學長期並行的其實還有經世之學。它較之晚近學者所論述的所謂“實學”，更加明顯和實在。近世思想史的著述中，早期的通常將經世之學的興盛甚至興起，置於19世紀中葉中外關係開始發生丕變的時候，稍後的則將它上移到17世紀的明末清初時期，再稍後的又將它上推至16世紀晚期明朝面臨全面危機的時候。其實經世思想和經世之學本來就是近世儒學的重要構成部分，內聖外王觀念中的“外王”部分的展現，就是經世之學的具體內容。我從丘濬《大學衍義補》這本經世之學巨著的成書背景及其影響力的研究，證示出明人以獲取實事知識應用於解決實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之學同時並行，普遍對讀書入仕的士人有實在的影響。

《大學衍義補》是丘濬補充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作。《大學衍義》則是發揮和填實《四書》中的《大學》的義理並使之具備實用意義之作。真德秀認為《大學》所教，有能使人君“清出治之源”和使人臣“盡正君之法”的巨大作用。他以《大學》所列格物、致

^① 此節所論，根據以下三文：(1) Hung-lam Chu, “Ch’iu Chün and the *Ta-hsteh yen-i pu*: Statecraft Thought in Fifteenth-century China.” (丘濬及其《大學衍義補》: 15世紀中國的經世思想;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 International, 1984. (2) 朱鴻林《理論型的經世之學——真德秀大學衍義之用意及其著作背景》，《食貨月刊》第15卷第3、4期(1985年9月)，頁16—17; (3) Hung-lam Chu, “Ch’iu Chün’s *Ta-hsteh yen-i pu*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丘濬《大學衍義補》在16、17世紀的影響) *Ming Studies* Number 22 (Fall 1986), pp. 1—32.

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條目為框架，引用儒家經典與子史之言，並及宋朝帝王的言論，再加上自己的議論，論述了清明政治的本源大法。在實際的內容處理上，真德秀此書卻只是推衍了《大學》條目中由格物到齊家的前六項，沒有推衍治國、平天下後兩項。他的理據是理學家常用的擴而充之的邏輯，意思即是，只要前六個條目能够充分體驗，餘下的兩個條目自可迎刃而解。用理學的哲學觀念說，有“體”自然有“用”。

真德秀這樣的做法，是他的著書旨意的結果。他固然希望自己此書是一本幫助帝王修身治國的全能經典，但他更直接的著書目的，是想讓年輕的宋理宗皇帝知道如何負上治國的個人責任和注意當前的政治大事；他寄望此書所說的，能幫助宋理宗成爲一個獨立勤政而擁有實權的君主。宋理宗當時面對着兩個情況。其一與宋朝的政制有關：宋朝的宰相是負責經常朝政的法定官員，宋朝的皇帝則在理論上不必是實際的行政首腦。這情況使得君主對於擁有詳細的、技術性的行政知識的要求，相對較少較低。其二則與他個人的帝位繼承問題以及權相對帝位繼承的過度影響問題有關：宋理宗近乎戲劇性地獲得的帝位，當時並沒有必定持續的保證。真德秀因爲對理宗寄予厚望，所以他的理論要點在於美善和強化理宗的個人修養。真德秀這樣的做法，有其實用意義，但《大學衍義》作爲一本推衍治國平天下道理的書籍，卻在概念上和內容上都不完滿。

這個理論上的缺陷以及明朝君主在洪武年間廢相之後須要親身決定政事的政制情形，土木之變後明朝所面臨的挑戰和所感到的危機，都是丘濬著作《大學衍義補》的重要原因。簡而言之，他想要當時的皇帝乃至以後的皇帝，當時的人臣以及準備學古入官的士子，知道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治國平天下事情在各個主要範疇內的理論性和現實性問題。《大學衍義補》在丘濬來

說，有這樣的雙重意義：一方面這是他的政治改革藍圖。他希望透過他的指出和論述，此書中所提及的各種時政問題，其已然的得以有所改革，其未然的得以有所規劃。另一方面這是他的經世之學的參考書本。他希望凡參與或期待參與治理國家社會的人們，都能從它獲得經典所載的原理性知識，以及知道歷史所提供的事例性知識。

無論作爲改革藍圖或作爲政治知識參考書看，這本一百六十卷另加書前一卷、字數過百萬的《大學衍義補》都是成功之作，沒有辜負丘濬約花十年纔得完成的心血。此書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明孝宗皇帝登基後奏呈。它所述論的事情，分類爲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國用、明禮樂、秩祭祀、崇教化、備規制、慎刑憲、嚴武備、馭夷狄、成功化十二個與“治國平天下”事情有關的項目。書前另加的一卷題作《審幾微》，直接對《大學衍義·誠意正心之要》部分作補充，內容可以顧名而思義。《大學衍義補》的內容不必在此悉述，要注意的是此書所受到的待遇。此書由禮部上表進呈後，獲得明孝宗這樣的批答：“覽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①丘濬因此獲得升官禮部尚書，《大學衍義補》則被命由建陽書坊以官費刊行，傳送各級政府學校。

對思想史研究更重要的，是此書刊行後在明清時段所獲得的反應。這反應最簡單地可從以下幾方面說。(1)此書曾見引用於多種16世紀開始出現的經世著作：陳子龍等纂《皇明經世文編》選錄文字最多的著作，便是此書和楊一清及徐光啓的著作；大學問家如王圻、顧炎武、方以智等，著名文人如陳仁錫、錢謙益等皆有稱引。(2)此書自弘治元年(1488)首刊之後，直到明亡的一百五十

^① 《明孝宗實錄》卷七，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年，頁135；也見於丘濬《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七《進大學衍義補奏》。

多年間,至少在福建、北京、常州等地出現過八個不同的刻本,其中包括了一個萬曆內府刊本和一個以後被多次翻刻的陳仁錫評本;清朝除了抄入《四庫全書》子部之外,至少還有兩個新的刻本;在域外,朝鮮李朝在 1487 年曾下令刊行(原書現今未見),日本有篠山藩 1792 年刊本,原書尚存。(3)此書在明代至少在福建、江西、徽州、南京等地刊行過八個節本;在清初至少有過兩個節本,包括後來常被翻刻的陳宏謀乾隆二年(1737)刊於雲南的《大學衍義補輯要》。(4)此書所揭示的、以有考據的歷史經驗作為經世事情的參考,以及政治和社會上各種修補性改革等主張;此書所蘊涵的“行”以實“知”、“理”“事”相資、“用”以成“體”的思想,都曾在明代引起過不少支持和反對的反應性言論和五本這樣性質的著作,包括夏良勝的《中庸衍義》和湛若水的《聖學格物通》在內。(5)此書關於明朝部分的内容,由於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所以在晚明時代曾經引發一些性質相同和體裁接近的繼起之作,像吳瑞登的《皇明繩武編》和陳仁錫的《皇明世法錄》等皆是。

《大學衍義補》的文書歷史反映了這樣的情況:涵寓實用思想的經世之學,在明代至少與哲學性的心學是並行的,同樣受到重視和同樣實際流行。丘濬在晚明成為學者們的家傳戶曉人物的情形,我們或許可以不管,但在論述明代思想史時,至少從 15 世紀中葉丘濬的時代開始,經世之學的思潮和活動是不應視而不見的。如果再從《大學衍義補》這本書的思想史根源看,我們便更無理由懷疑經世思想在宋元明時代的學術傳統中的重要性。這個傳統如果在觀念上或在行事上是軟弱的,我們便難以想象丘濬能構思和撰寫出這樣一本巨著,而此書又會在之後的明清兩代如此流行。我們因而發問求解的史事應該包括:(1)同時代的經世之學的授受形式和展現成果;(2)同時代的思想史面貌和動力。就這二點而言,我曾對 16 世紀初期湛若水以講述“前言”為主的帝學著作

有過述析,^①對 15 世紀心學和經世之學並行和開始融渾時的明代學術思想特色作過一些初步的探討。^②明顯地,有待探究的園地是廣闊的,而其他時段的思潮和思想特色也可以個案式研究去進行的。

《大學衍義補》的研究給了我這樣的體會:在理學的大思潮中,應該在心學和經世之學之外還有其他具備傳統的學術和思路,而其發掘、追溯與敘述、論說,同樣可以從一本文書、數種文書或一類文書入手。個別的“點”多後,整個的“面”將有不同。

五 王陽明從祀孔廟事情的意義^③

我對王陽明從祀孔廟的事情及其思想史意義的探討,也是建基於一個深入的文書和傳記個案研究的。這個研究的普遍意義關心點是,一個偉大人物所受到的身後觀感的變化。它的具體問題則是,隆慶、萬曆年間王陽明被題請從祀孔廟時,人們是怎樣看待他的人物和學術的,他是根據什麼標準最終獲得從祀的,孔廟從祀制度的思想史意義又是什麼樣的。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學說是一流的學說,他平南贛、平

① 朱鴻林《明儒湛若水撰帝學用書〈聖學格物通〉的政治背景與內容特色》,《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2 本第 3 分,1993 年,頁 495—530。

② Hung-lam Chu,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15 世紀的學術思潮) *Ming Studies* Number 27 (Spring 1989), pp. 1—33.

③ 此節所論,根據 Hung-lam Chu, “The Debate over Recognition of Wang Yang-ming,” (關於承認王陽明的辯論)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8, No. 1 (1988), pp. 47—70。此文的中譯增定本《王文成公全集》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載楊聯陞、全漢昇、劉廣京主編《國史試釋——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下,臺北,食貨出版社,1988 年,頁 567—581。

寧藩和平藤峽的軍功是動人的事功,這些都是世所公認的。這樣認識的結果,曾使近代人們對於他的評價走上一些公式化途徑:有些將他視為殘酷的階級壓迫者,有些則視他為偉人因而也是完人。在出現過的論著中,評述陽明學說的精粗和事功的優劣的,多於述說他的實際行事經過的,而述論明朝尚盛時士大夫對於陽明學行的看法的則不多見。我從陽明從祀孔廟的個案研究中得出這樣的結論:當時人看王陽明的重要性時,是從他的事功着眼多於從他的學說着眼的,客觀的根據始終勝過主觀的論斷。這個研究的發端,卻是從兩個不同版本的早期陽明文集《王文成公全書》中間所呈現的問題而來的。

根據權威性的書目所載,現存最早的王陽明全集《王文成公全書》有這樣兩個版本:一個是隆慶二年(1568)的郭朝賓杭州府刊本,一個是隆慶六年的謝廷傑應天府刊本。杭州本看來流傳甚少,現在已成十分稀珍;應天本因為收入《四部叢刊》,所以是相當易見的明刊原本。我在閱讀了杭州本後,發現它除了在版式和字體上,在登錄編輯者和校閱者的詳略情形上,和應天本有所不同之外,在卷數上(三十八卷),在詩文內容、詩文分集分卷和目錄上,乃至在正文之前的陽明官服小像、像贊、舊序五篇和《刻文錄敘說》等圖像的形式和文字的內容上,都和應天本沒有兩樣。最大的分別只有兩處:一是應天本書前冠有不署年月的徐階撰序一篇,而杭州本沒有任何序跋;二是應天本目錄前有“彙集全書姓氏”一名以及“督刻全書姓氏”三名。彙集姓氏所列只有謝廷傑一人,頭銜是“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督刻三人則是應天府推官周恪、上元縣知縣林大猷、江寧縣知縣李爵。杭州本目錄前則有“刻王文成公全書姓氏總目”一表,上列浙江一省及杭州一府各級官員三十五名,其中第三名是“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謝廷傑”。這資料顯示了,實際令到應天本刊刻成書的謝廷傑與杭州本必有關係。

在細看應天本前的徐階序後,又發現徐階此序寫於謝廷傑尚任浙江巡按御史之時,它原來正是為杭州本而寫的。在將謝廷傑以及杭州和應天兩刻的參與者的任官年份考核過後,我知道《四部叢刊》本和其他書目給這兩刻所定的年份都是錯誤的。正確的刊行年份應該是:杭州本刊於隆慶六年(1572),而應天本刊於萬曆元年(1573)。

這個新的認識帶來了幾個問題。如果徐階序原是為杭州刊本寫的,為何竟會不予登載(我所見的兩個現存杭州刻本都沒有此序)而又出現在應天本之上?謝廷傑為何要在應天府再刻《王文成公全書》?為何兩刻同是官刻,杭州本的題名贊助者陣容異常龐大,而應天本只由謝廷傑領導三個地方官從事督刻?在連接兩年中要在距離不遠的都會之地杭州和應天(南京)刊行內容相同的王陽明全集,究竟有何涵義?這些問題明顯超出了目錄學的範圍,而進入到思想文化史的範圍。

我接着的研究顯示了,這事情首先而且直接與隆慶初年至萬曆初年朝廷爭論王陽明從祀孔廟的事情有關。我將這件事情的人事脈絡和進展過程探索後,看到爭議的兩層意義:其一是隆慶、萬曆年間的人們對於王陽明的人物及其事業的重要性的不同看法,另一則是高拱派下的官員(尤其言官)和他們的政敵的借故鬥爭。王陽明在萬曆十二年(1584)從祀孔廟。但給予他從祀孔廟的題請,早在隆慶元年(1567)王陽明的政治地位獲得平反(贈新建侯,賜謚文成)和明代大儒薛瑄被請給予從祀孔廟時已經開始。但由於當時在廷得勢的高拱派的反對,沒有成果。在以後的七年半中,我們見到請求從祀王陽明的奏疏至少有八封,反對的則至少有三封。薛瑄在隆慶五年獲得從祀,而陽明從祀問題的爭議,最激烈的時間集中在隆慶六年十二月至萬曆元年七月期間。這期間正是謝廷傑分別在杭州和應天刊行《王文成公全書》的時間。謝廷傑是

支持給予陽明從祀的，而首次成刻的陽明全書則是支持陽明人物和學說的文字證據。

研究顯示，當時出現了一種多人的努力，冀使王陽明成為朝廷公認的真儒。然而這種努力的趨向，卻是政治性多於學術性的。從《王文成公全書》的刊布歷史來看，杭州和應天在連續兩年內出現此書的不同刻本，其實並非讀者眾多、需求增加的反映。事情只是謝廷傑一人刻意效忠陽明的結果，而其起因則是意外的高層政治鬥爭。首次彙編刊行《王文成公全書》的謝廷傑（江西新建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其人的隱晦，對陽明學界來說更是一種諷刺。怎樣解釋他的努力所受到的忽視？假如謝廷傑品行無足稱道，其彙刊陽明全書為的只是個人私利，而又居然能夠從心所欲，那末王學之徒不是人數太少，便只能是漫不經心或漠不關心。這和我們一般了解的晚明王學盛行和王門勢眾的情形是不協的。杭州本《王文成公全書》刊刻過程中所出現的矛盾，顯示了浙江官員對傳揚陽明著述之事其實並不主動和熱心；而應天本刊刻時，連南京地區眾多號稱王門中人的公開支持也沒有的情況，更顯示出所謂的王門實際上並無團結精神。從整體看，當時大部分的王學之徒，他們對於將陽明變成教主式的象徵的興趣，遠超過認真追求陽明學說或仿效陽明行事的興趣。當時人們看陽明的重要性，是從他的事功着眼多於從他的學說真義着眼的。一言以概之，當時人並不單純地將王陽明看成如同後人所強調的心學宗師。因此真儒的素質和真儒所代表的學術內涵，也不是一般思想史論述所能容易切當地概括的。

六 結 語

思想史的職志，在於記述一段較長時間之內，一個地域所見的人類思維模式，各種與世界和人生有關的觀念、理想、主張的內容，及其形成與變化的情狀和因由。思想史的素材，是個別人物因其知識、感受而產生的思想；思想史的研究單位，因為涉及思想形成與變化的情狀和因由，除了是寓載思想的個別文書之外，還有產生思想的個別人物的傳記。

文書包括完整的學術論著和文學作品，各種體裁的文章、詩歌、書信，以至未完成的稿件。傳記雖然多是與傳主時代接近的個人或機構對於傳主的記述和評論，但傳主所作的文書，卻是其個人傳記的原始資料。文書所見的思想一致性和矛盾、扭曲等，乃至其說服力之有無，都可以從其作者生平處獲得解釋。^①因此，傳記與文書交相為用，互相取證，構成深入了解個別人物的思想所不能或缺的元素。思想史的大段描述，便是眾多個人傳記和個別文書研究所得的綜括述論。對於素材如果只有片面和破碎的認識，綜述便難免於以偏概全或抽象模糊的情狀。

本文以上所列舉的個案研究顯示了，現有的宋元明思想史，其內容還存在不少缺憾，而補救之道應從對前人之說作修正、增補、延伸之類的基本面事情做起；從處理他們曾處理過的問題、利用他

^① 這個論點，參看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osué V. Harari, in J. Harari, ed.,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41—160; reprinted in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91), pp. 101—120.

們所利用過的資料的過程中,認識和解答新的相關問題;而深入細緻的傳記和文書個案研究,實有助於使它的面貌趨於清晰,脈絡趨於分明,使它的真相和全像漸漸顯現。

無論多麼抽象的思想,由於它是人的思維所生,所以它也是思想家的一部分。由於思想家總受到他所處的時代以及他所屬的文化傳統所影響,所以思想史研究不必也不應囿於抽象理念的論析,思想家的具體言行及其意義都是合適的研究對象。^① 思想家的傳記研究要求我們同時需要涉及政治史、社會史、制度史的研究。文書的研究也要求我們利用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的知識。這些相關的研究和研究工具,都是未來的宋元明思想史研究所必須欣然接受和樂於利用的。

(本文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① 晚近關於中國思想史的寫法以及應予考慮的相關問題的論述,可參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思想史的寫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